

BuddhistRoad 出版物: 摘要

Doney, Lewis, Carmen Meinert, Henrik H. Sørensen 与 Yukiyo Kasai 编: 《中亚的佛教 III: 非佛教因素的影响与教义》, 莱顿: 博睿出版社, 2023 年。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ea/bb/eabb9e6-89e3-4df4-9b0b-92a28e0b40da/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ii_doney_meinert_sorensen_kasai_ed_2023_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ii.pdf

(1) Biran, Michal: 《伊斯兰教向中亚的扩张和穆斯林与佛教徒的相遇》, 载于 Doney, Lewis, Carmen Meinert, Henrik H. Sørensen 与 Yukiyo Kasai 合编: 《中亚的佛教 III: 非佛教因素的影响与教义》, 莱顿: 博睿出版社, 2023 年, 第 13–64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de/45/de45213e-ddba-49c4-9f27-8ca3bfeaf32f/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ii_01-biran_2023_islamic_expansion_into_central_asia.pdf

摘要:

该研究回顾了 7–16 世纪伊斯兰教向中亚(从伊朗东部到塔里木盆地)的扩张, 强调了穆斯林与佛教徒的接触。 本文首先讨论了伊斯兰帝国向中亚军事扩张的最初时期, 在征服者遇到的定居人口中, 佛教只是一种相当边缘的宗教。 文章认为, 从 10 世纪末开始, 穆斯林在中亚的进一步扩张主要是由于游牧民族或后游牧民族集团的伊斯兰化, 他们归信伊斯兰教主要是为了获得社群认同和合法性。 大约在同一时期, 东亚和中亚的其他游牧和半游牧群体由于类似的原因, 以归信佛教作为其国家组成的一部分。 这些穆斯林和佛教政体通过贸易联系在一起, 有时也通过婚姻和政治联盟相联系, 但在蒙古人征服之前,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有意义的思想交汇。 蒙古时期(13–14 世纪)不仅促成了伊斯兰教的巨大扩张, 还将伊斯兰教和佛教置于同一个统治之下, 并为穆斯林和佛教徒的思想交流注入了活力。 在蒙古人的统治下, 穆斯林和佛教徒成为使蒙古人归信的主要竞争者, 这一过程最终导致了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在草原上的分野。

(2) Loukota, Diego : 《魔女与多情的猴子: 于阗宗教中的非佛教基础》, 载于 Doney, Lewis, Carmen Meinert, Henrik H. Sørensen 与 Yukiyo Kasai 合编: 《中亚的佛教 III: 非佛教因素的影响与教义》, 莱顿: 博睿出版社, 2023 年, 第 65–89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bc/53/bc533bbd-9537-4ba3-808b-ac6303f5398a/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ii_02-loukota_2023_witch_woman_and_amorous_monkeys.pdf

摘要:

本文研究了于阗早期历史中构成佛教文化基础的非佛教传统因素, 重点探究了波斯本土以及印度和中国文化的影响。 该文考察了于阗存在的波斯和或为希腊的神祇, 以及非佛教的印度神祇和中国的宇宙观, 同时涉及了血祭, 拜火, 祭山, 生殖崇拜, 星宿占卜和丧葬风水等习俗。

(3) Willkens, Jens: 《回鹘佛教与摩尼教和本土宗教的影响：以宗教术语为例》，载于 Doney, Lewis, Carmen Meinert, Henrik H. Sørensen 与 Yukiyo Kasai 合编：《中亚的佛教 III：非佛教因素的影响与教义》，莱顿：博睿出版社，2023 年，第 90–122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f3/f1/f3f1c4d4-94e4-4062-9971-](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f3/f1/f3f1c4d4-94e4-4062-9971-6d5736d4fe52/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ii_03-wilkens_2023_uyghur_buddhism_and_the_impact_of_manichaeism.pdf)

[6d5736d4fe52/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ii_03-wilkens_2023_uyghur_buddhism_and_the_impact_of_manichaeism.pdf](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f3/f1/f3f1c4d4-94e4-4062-9971-6d5736d4fe52/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ii_03-wilkens_2023_uyghur_buddhism_and_the_impact_of_manichaeism.pdf)

摘要：

回鹘佛教的出现源于一个特殊的文化环境，其不仅受到吐火罗、汉地、粟特以及后期(13–14 世纪)藏传佛教等文化的强烈影响，而且由于汗廷对摩尼教的支持促成了西州回鹘(公元 9 世纪下半叶–13 世纪)的宗教景观。尽管佛教对摩尼教的影响远比摩尼教对佛教的影响大得多，但后者在回鹘的佛教文献形成过程中具有一定作用。在吐鲁番和敦煌的佛教与摩尼教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回鹘本土宗教的微弱痕迹。本文试图指出这些内容，讨论或有助于我们确定应该如何构想回鹘人本土宗教的方法论问题，并描述某些比较方法的适用范围。无论摩尼教和本土宗教的影响有多么微弱，其对西州回鹘汗国当地特殊的佛教形式发展都有所贡献。

(4) Deeg, Max: 《唐朝中国的基督教社区：在适应与宗教的自我认同之间》，载于 Doney, Lewis, Carmen Meinert, Henrik H. Sørensen 与 Yukiyo Kasai 合编：《中亚的佛教 III：非佛教因素的影响与教义》，莱顿：博睿出版社，2023 年，第 123–144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33/20/3320ad18-1722-4f78-af53-](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33/20/3320ad18-1722-4f78-af53-19c18180c32e/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ii_04-deeg_2023_christian_communities_in_tang_china.pdf)

[19c18180c32e/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ii_04-deeg_2023_christian_communities_in_tang_china.pdf](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33/20/3320ad18-1722-4f78-af53-19c18180c32e/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ii_04-deeg_2023_christian_communities_in_tang_china.pdf)

摘要：

本文将讨论在具有强大的宗教竞争者(佛教、道教)和国家(朝廷)管制为主导的社会和文化大背景下，唐朝基督教小众和散居社群自我表述的“策略”。少数保存下来的文献(即敦煌文献)表明，该社群在用汉文介绍他们的宗教时，大量借鉴了佛教术语并继承了中国的宗教文化概念，但在以半官方的方式介绍自己时，又采取亲朝廷而区隔于其他宗教的策略(例如藏于西安的碑刻)。

(5) Sørensen, Henrik H.: 《论道教在敦煌佛教材料中的存在和影响》，载于 Doney, Lewis, Carmen Meinert, Henrik H. Sørensen 与 Yukiyo Kasai 合编：《中亚的佛教 III：非佛教因素的影响与教义》，莱顿：博睿出版社，2023 年，第 145–182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ce/22/ce221f02-c6d8-4b36-ab47-](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ce/22/ce221f02-c6d8-4b36-ab47-a368afbb8cff/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ii_05-sorensen_2023_presence_and_influence_of_daoism.pdf)

[a368afbb8cff/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ii_05-sorensen_2023_presence_and_influence_of_daoism.pdf](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ce/22/ce221f02-c6d8-4b36-ab47-a368afbb8cff/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ii_05-sorensen_2023_presence_and_influence_of_daoism.pdf)

摘要：

本章旨在介绍我们在敦煌写本里发现的佛教材料中所涉及的道教元素类型。我们所说的“道教元素”是指起源于道教的概念、实践和信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概念、实践和信仰通过一个持续而漫长的过程逐渐融汇入佛教，一如道教也同时在吸纳、借用和调适佛教的重要内容。

敦煌佛教材料中反映的这类道教影响有多种形式。不过，最密集的影响主要集中体现在佛教伪经和与密教相关的写本中。护身符和符印是佛教从道教中吸纳的元素之一。尽

管佛教徒创造了大多数情况下体现佛教概念, 神祇和功能的类型, 但使用的方式有明显的道教印记。若要指出一种用来理解和强调佛教吸纳了道教实践的概念模型, 则这类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几乎主要是中国的传统科学, 如星象学, 医学等等。

(6) **Doney, Lewis**: 《早期西藏宗教文献中的非佛教神灵》, 载于 **Doney, Lewis, Carmen Meinert, Henrik H. Sørensen** 与 **Yukiyo Kasai** 合编: 《中亚的佛教 III: 非佛教因素的影响与教义》, 莱顿: 博睿出版社, 2023 年, 第 183–211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41/77/41774fbb-d282-4fa1-b635-d5d26fb28211/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ii_06-doney_2023_non-buddhist_superhuman_beings.pdf

摘要:

本研究讨论了西藏及后西藏时期西藏仪轨记述的流变皇帝时期(约公元 600 年–850 年)文献中明显的非佛教习俗和神灵, 这些习俗和神灵很晚才被纳入缓慢形成的苯教(藏文: *bon*), 但在更早的时候就影响了快速发展的藏传佛教(不过影响微弱)。尽管我们对之前存在西藏本土宗教的证据提出了质疑, 更遑论在西藏有单一的前佛教宗教, 不过本研究识别了一些影响后来佛教实践, 意识形态及史学的仪式, 信仰和叙事—既积极地纳入其中, 又消极地形成与藏传佛教认同对抗的“他者”。

(7) **Berounský, Daniel**: 《西藏及后西藏时期西藏仪轨记述的流变》, 载于 **Doney, Lewis, Carmen Meinert, Henrik H. Sørensen** 与 **Yukiyo Kasai** 合编: 《中亚的佛教 III: 非佛教因素的影响与教义》, 莱顿: 博睿出版社, 2023 年, 第 212–254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69/36/693629ab-2953-4e65-a3e1-5eaf10a2ccad/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ii_07-berounsky_2023_the_fluid_lives_of_tibetan_ritual_narrations.pdf

摘要:

从 8 世纪起, 佛教开始在西藏皇帝(藏文: *Bod chen po*, 约公元 7 世纪至 842 年)发挥重要作用。佛教进入西藏后, 缺乏旨在解决个人或社会生活中重要事件的普适性仪轨传统。这些仪轨都是由具有神通的苯教(藏文: *gshen* 或 *bon*)咒师来完成, 直到现在, 西藏的佛教仪轨仍深受苯教咒师后代的影响。

仪轨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唱诵(藏文: *gyer*)仪轨记述(藏文: *smrang*, 参见: *smra*, 讲说)的神变, 以便赋予仪轨意义。现存的起源神话历史(藏文: *rabs*, 与“世系/传承”相关)或许反映了后来的一种趋势, 即将多种原始本土神话整合入跨越青藏高原较大区域的此类记述的统一整体之中。通过突出一些传统而压制另一些传统的过程, 使不同性质的仪轨传统自成一体。后西藏时期的苯教文本将不同起源神话的唱诵传统与知识或学问(藏文: *gtsug lag*)一词相联系。由此可以推测, 多种多样的仪轨记述都是由这样的总括性术语组织起来的。我们可以观察到西藏中部的仪轨传统与西藏西部, 北部和东部的广大地区的仪轨传统之间存在着某种分野。本文主要介绍了存于《苯教甘珠尔》(*Bon bka' 'gyur*)中的《四十万经》(*'Bum bzhi*)。这些卷帙浩繁的文本主要包含起源神话和涉及四种神灵的故事—(1) 冥神(藏文: *klu*), (2) 恶灵(藏文: *gnyan*), (3) 地祇(藏文: *sa bdag*), (4) 岩灵(藏文: *gtod*)—很难确定其当前形态。它们含有反映苯教发展阶段的痕迹及其吸收佛教因素的证据。不过, 它们也保留了西藏东部非佛教仪轨传统的一些特征, 尽管它们的编纂背后可能隐藏着将这些地区的传说纳入泛西藏仪轨传统之中的企图。

(8) Meinert, Carmen: 《人物, 地点, 文本和主题: 再探西藏及后西藏时期 (公元 7–10 世纪) 禅宗在中亚东部传播的背景》, 载于 Doney, Lewis, Carmen Meinert, Henrik H. Sørensen 与 Yukiyo Kasai 合编: 《中亚的佛教 III: 非佛教因素的影响与教义》, 莱顿: 博睿出版社, 2023 年, 第 257–295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dc/28/dc2834aa-d638-488d-9337-062af62022c3/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ii_08-meinert_2023_people_places_texts_and_topics.pdf

摘要:

作为西藏皇帝 (约公元 8 世纪至 842 年, 藏文: Bod chen po) 和后来的唐古特王朝 (约公元 1038 年至 1227 年, 即汉文史料中的西夏) 的一部分, 青海湖以东地区是一个重要的多元文化地区, 将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同样多样化的绿洲城镇与汉藏文化区联系起来。本章在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下探讨了这些文化之间冲突地域的发展。本章还探讨了宗教, 特别是与著名的“桑耶僧诤”有关的汉传佛教的禅宗和藏传佛教化的禅宗, 以及在公元 9 世纪和 10 世纪的权力斗争中与著名的藏传佛教大师贡巴饶赛 (公元 892–975 年, 藏文: dGongs pa Rab gsal) 有关的对禅宗的使用。这些扩展了禅宗大师, 文本和主题如何在微观历史层面上通过中亚东部的地方和跨区域交流中发挥作用的图景。因此, 本章汇集了与禅宗有关的人物, 地点, 文本和主题的内容, 以便对青海湖以东冲突地域的地理空间进行定位。

(9) Howard Masang, Meghan: 《汉藏佛教经院学: 以敦煌〈缘起心论〉为例》, 载于 Doney, Lewis, Carmen Meinert, Henrik H. Sørensen 与 Yukiyo Kasai 合编: 《中亚的佛教 III: 非佛教因素的影响与教义》, 莱顿: 博睿出版社, 2023 年, 第 296–349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c2/4e/c24ed802-7853-438b-a282-c2d7d47e443d/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ii_09-howard_masang_2023_the_pratityasamutpadahrdaya_in_dunhuang.pdf

摘要:

本文通过对敦煌发现的《缘起心论》(*Pratītyasamutpādaḥṛdaya*) 以及与之相关的汉藏注释文本的研究, 探讨了经院 (*sāstric*) 知识如何在多语种的社群之间传播的问题。笔者主要着眼于三个文本: 可能由著名汉藏译师吴法成 (约卒于公元 864 年, 藏文: 'Go Chos grub) 抄写的藏文序言 (P. T. 767), 一套《缘起心论》的藏文注疏 (P. T. 762 和 P. T. 766), 以及一部可能由法成执笔的汉文注释, 即《因缘心释论开决记》(T. 2816.85), 简称《心论》。笔者认为藏文序言是为了与“注疏” (藏文: *mchan tig*) 一起流传, 诸如 P. T. 766 这样的“注疏”也应被视为其本身的注释。笔者进一步指出, 这三个文本在结构, 内容和措辞上有相应之处, 或许表明汉文注疏大致综合了印藏的内容。最后, 笔者指出了 9 世纪藏传佛教对敦煌佛教汉译文本的影响, 并强调了文本形式 (物质性) 以及翻译和口传等学术实践 (社会背景) 对经院文本和传统的历史的重要意义。

(10) Kasai, Yukio: 《五体投地还是五轮投地? 回鹘译师与密教之接触》, 载于 Doney, Lewis, Carmen Meinert, Henrik H. Sørensen 与 Yukiyo Kasai 合编: 《中亚的佛教 III: 非佛教因素的影响与教义》, 莱顿: 博睿出版社, 2023 年, 第 350–372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30/3a/303a98ef-137e-4f7b-b40d-6e4ed42b7bcd/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ii_10-kasai_2023_wuti_toudi_or_wulun_toudi.pdf

摘要:

随着不空 (705–774 年) 的出现, 密宗佛教在唐朝 (公元 618–907 年) 经历了一个全盛时期。这一佛教传统不仅在中原汉地盛行, 而且还远播周边。在中亚东部的敦煌, 莫高窟第 17 窟藏经洞的写卷中有许多文本, 证明了这一佛教传统在那里也备受欢迎。敦煌与其邻近地区联系紧密, 因而, 密宗佛教很可能在包括吐鲁番地区的整个中亚地区传播。当时吐鲁番处于高昌回鹘治下, 由于缺乏显示密教在回鹘蓬勃发展的材料, 之前许多关于吐鲁番佛教的研究主要是回鹘的佛教崇拜, 并没有强调密宗佛教从敦煌到吐鲁番的传播。为此, 本文以与汉传佛教术语“五体投地/五轮投地”相对应的古回鹘文表达为例, 说明在前蒙古时期, 密教或已传给了少数回鹘译师。

(11) Doumy, Mélodie 与 Sam van Schaik: 《莫高窟第 17 窟的丧葬背景》, 载于 Doney, Lewis, Carmen Meinert, Henrik H. Sørensen 与 Yukiyo Kasai 合编: 《中亚的佛教 III: 非佛教因素的影响与教义》, 莱顿: 博睿出版社, 2023 年, 第 373–400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34/2f/342f147f-6404-4a77-8df4-94c5ac7a76c3/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ii_11-doumy_and_van_schaik_2023_the_funerary_context_of_mogao_cave_17.pdf

摘要:

莫高窟群中被封存的第 17 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最重要的原始资料, 以了解中亚东部, 中国和西藏的佛教, 以及在某种程度上非佛教的教义和实践。关于石窟的原始功能, 目前很少有注意到佛教仪轨细节的理论。我们将在本文中对第 17 窟的研究重新调整为洞窟及其内容的丧葬功能。为了更好地理解第 17 窟的内容, 我们将研究第 17 窟作为佛教丧葬龕洞的作用, 并将其置于把书籍和其他宗教物品作为圣物装藏于佛塔和神龕中的佛教葬仪背景下。